

留在国统区的抗日战士达维德·扬库

□ 杨 娜



1910年，达维德·扬库出生在罗马尼亚的一个工人家庭。19岁时，他考入雅西医学院，很快就加入罗马尼亚共产党。1936年，扬库取得外科博士学位。同年，他加入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在奋勇抢救伤病员的同时，扬库时刻关注着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十分钦佩中国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淫威面前的顽强抵抗。国际纵队从西班牙撤退后，我和其他同志一样，希望到中国抗日前线去，继续为反法西斯而战。”从集中营脱险后的扬库和其他欧洲进步青年毅然决定奔赴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

心向延安却被分配到国统区工作

1939年8月，扬库参加国际援华医疗队，携带国际进步团体募捐的大批医疗卫生物资，从英国的利物浦港出发，经过6个星期的航程抵达香港，受到“保卫中国同盟”领导人宋庆龄和当地媒体的热烈欢迎。

扬库来华之前就已听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事迹，十分向往延安。一到中国，扬库就希望尽快到中共直接领导的第18集团军去，但由于陆上交通被日军切断，香港到内地的行程受阻，扬库和其他医疗队成员只能先由海路到达越南，再转陆路经广西柳州、南宁，于1939年10月16日到达贵阳附近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所在地地图云关。扬库被分配到四川省军队第30师医院，负责救治军队和当地百姓的伤病员。

扬库向国民政府提出到敌后战场去，遭到断然拒绝，他只好先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但是，在30师医院见到的一切令扬库大失所望。国民党结党营私、贪污腐化，无视百姓死活。军队中，军官占用着为数不多的医疗资源，伤病员则躺在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疟疾、霍乱等传染病在军中流行，士兵健康状况无法得到保障。在江西南前线，扬库亲眼看到伤病员得不到应有的护理，



1939年，达维德·扬库在中国

许多人直接躺在院子里的泥地上，在寒冷的冬季里由于没有棉被而被冻伤。扬库离开国民党军队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周恩来的指示支撑着他在国统区坚持6年

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有预谋地发动了“皖南事变”，其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发展到顶点。扬库对国民党彻底失去信心，甚至表示“与其留在国统区工作，不如回国”。他和另外2位援华医生一起到重庆面见中共代表周恩来，再次提出希望到抗日根据地去从事医疗工作的请求。

这些外国医生深知敌后战场的工作条件更为艰苦，仍坚决要求前往，这种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令周恩来十分感动。他们的精湛医术无疑有助于切实改善抗日根据地的医疗状况。但是，在国民党疯狂的军事封锁之下，如果贸然前往，这些医疗专家将要冒极大的风险，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愿意看到的。同时，除了“援华医生”的身份以外，扬库等人也都是具有坚定信念的“战士”，如能坚持在国民党军队工作，必将有效争取国民党中的爱国官兵共同抗日。

于是，周恩来耐心说服扬库等医疗队成员，向他们阐述了国共合作的复杂形势和前往敌后战场的现实困难，劝说他们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周恩来对扬库说：“无论在哪里工作，你们都是为中国人民抗战服务，是对中国人民的宝贵支持。”

在中国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扬库曾3次与周恩来相见，这对他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扬库转变了思想，意识到“只要与中国军民一起战斗，在哪里都是抗日”。他后来回忆说：“周恩来总理给我的指示是我终生难忘的，就是那些指示支撑我在国民党地区默默工作达六年之久。”在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扬库重新振作起精神，安心在国统区救死扶伤。

积极开展工作

明确了自己所做工作的价值意义后，扬库不再悲观沮丧。在极其简陋的环境中，他积极克服生活不便、设备不全的困难，夜以继日地医治伤病员、培训医务人员，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扬库在贵州、四川和云南等地整顿和筹建了许多医院。没有病房，就组织大家搭起木板棚；缺少医疗器械和病床，就用当地盛产的竹子做成病床、担架、手术台，用稻草做成床垫；没有消毒条件，就利用水烧开后产生的蒸气来消毒医疗用具。当时，因卫生条件差，士兵中流行一种疥疮，许多人全身长满了脓疮，十分痛苦。扬库经过多次试验，把硫磺和石灰按一定比例调成药膏糊在伤口上，取得了显著的疗效，治愈了数万名患者。伤病员康复后重返战场，不仅有效降低了非战斗减员数量，也极大鼓舞了部队士气。

扬库还积极筹办卫生学校，开设短期训练班培训医务人员，举办卫生知识讲座向国民党官兵普及急救知识和卫生学。他亲自编写教材，制作教具，亲自



1942年，秋达维德·扬库与中国护士

境问题。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着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系统构建全过程、多层次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及时妥善应对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持续强化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切实维护生态环境安全。

四是坚持绿色发展，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可以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好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部署，建设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健全碳排放数据质量管理制度，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聚焦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打造绿色发展高地。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推动“三线一单”成果应用。

五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我国生态环

讲课，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治疗技术传授给中国学员。在后来的战地救治工作中，这些学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扬库与士兵打成一片，吃同样的饭，穿同样的粗布制服，一起住茅草房，没有丝毫抱怨。在他的行为激励下，他所在的国民党军队官兵的抗日意志更为坚定，抗日热情更为高涨。

1942年初，扬库去到云南的蒙自山区部队工作。在那里，霍乱等传染病盛行，扬库不幸也感染上了斑疹伤寒，高烧几周不退，情况十分凶险。多亏德国援华医生贝尔赶来为他精心治疗，他的病情才得到控制，身体逐步康复。即使在患病期间，扬库仍坚持工作，为抗击瘟疫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3年上半年，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安排下，扬库同其他几位援华医生一起，随同中国部队进入缅甸北部的丛林继续参加抗日战斗。日本投降后，扬库经过数月的辗转，终于1946年1月返回罗马尼亚。回国后，他仍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情况，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1972年和1979年，他两次应邀访华。1990年5月9日，扬库因心脏病去世。

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扬库医生冒着生命危险，不远万里来到硝烟弥漫的中国进行支援。他怀着去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战的愿望来到中国，却被安排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是周恩来的劝导激励着他以执着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他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生死与共，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才回到自己的祖国，不愧为“罗马尼亚的白求恩式医生”。

13—14世纪，欧亚大陆上出现了蒙古帝国。借由陆地与海洋两大出口，蒙元时代实现了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东西交通畅通无阻，成为丝绸之路再度繁盛的保证。

蒙元时期的丝绸之路，可划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又可分为草原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其中，草原丝绸之路从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大青山、内蒙古长城沿线，越过阿尔泰山，沿额尔齐斯河流域北行，穿越南西伯利亚草原、黑海北岸，抵达地中海北路的欧洲地区；绿洲丝绸之路古已有之，主线以长安为起点，经过河西走廊西行，抵达敦煌后再分为南北两路西行。

南方丝绸之路以四川和云南两省为主线，穿越西南地区，与缅甸、印度相连接，是通往东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地区的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包括东、西、南三条主线，其中东线可抵达日本、高丽地区，西线可通过中亚、波斯、阿拉伯半岛，抵达地中海东部和东非海岸地区，南线能够抵达南洋诸国以及印度半岛。

为了保证陆上丝绸之路交通畅通和信息传递，元朝将国内的驿站体系顺着丝绸之路延伸到境外，连通了诸汗国。元朝与各汗国都派兵驻守驿道，颁布法令保护商旅。驿道路网打通了元朝与亚欧各地的联系，丝绸之路空前通畅，为东西方交往和贸易提供了稳定、便利、安全的国际环境。东西方之间络绎不绝的使节、商旅、僧徒、旅行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客观形势，综合利用丝绸之路路网完成自己的行程。

蒙元与中亚、欧洲的使节通过丝绸之路往来频繁。畏兀儿人列班·扫马奉伊利汗国阿鲁浑汗之命曾出使罗马教廷和西欧诸国。蒙古使节薛里吉思到过意大利谒见教皇。蒙古将军野里知吉歹派遣的使者曾到过塞浦路斯，在那里见到了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教皇和法国国王也多次派出使团、传教士访问蒙古。

蒙元时期的商业贸易也非常繁荣。大蒙古国时期，蒙古商队就远赴中亚贸易。蒙古西征后，包括马可·波罗在内的欧洲、西域商人利用日益开放的陆海通道东来，从事商业贸易，东西方贸易呈现出新局面。官方贸易主要通过钦察汗国与欧洲各国联系，通过伊利汗国与阿拉伯各国连通。朝贡贸易是元朝朝廷与其他蒙古汗国、西域各国之间友好往来的最常见手段。民间贸易私商群体庞大且多元化，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豪商小贾，特别是色目商人尤为活跃。整个欧亚，从东到西，韩鲁托克商人、喀里密商人、拜占庭商人、意大利商人彼此交流，形成横向联结，建立起欧亚世界贸易网络，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开展。蒙古帝国都城哈拉和林与元朝的大都相继发展成国际交通枢纽和亚欧贸易中心。东西方各国使节、商人、僧侣、工匠、艺人云集于此。蒙古四大汗国的首都皆为东西方交通的枢纽和商贸中心。

蒙元时期航海技术的提高，使得东西方交往变得更加便利。元朝继承并完善了唐宋以来的对外开放格局，加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与元朝有联系国家和地区超过200个，远达非洲东北部沿海。元朝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制定《市舶则法》，保证对外贸易的顺利开展。元朝在泉州、杭州设市舶都转运司，又在庆元（今宁波）、温州、广州等地置市舶司，市舶税银每年达“数十万锭”。元朝采用官营、官私合营鼓励和支持海外贸易事业。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常常利用海路进行贸易，杨廷璧、杨极、麦术丁等元代航海家，都曾率船队航行至东南亚、印度、波斯湾、东非从事贸易。中国出

蒙元时期的丝绸之路

□ 张连银 沈易泽



产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铁器、药材等商品通过陆路和海港大量远销海外，丰富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随着国际贸易向西方发展，元朝的纸钞出现在欧洲、西亚、北非。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和欧洲的特产，包括香料、珠宝、象牙、犀角等稀见物产也通过丝路输入中国。

蒙元发挥游牧文化流动性的特长，利用丝绸之路推动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交流、碰撞、互鉴、融合，并体现在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伊朗地区的学问、技艺、宗教、衣食传播到元朝，影响到元朝的建筑、饮食、医药、天文、历法、歌舞等方面，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伊斯兰的医药文化，极大地丰富发展了中国的医药技术和饮食水平。伊斯兰地理学、天文学随伊斯兰天文学家东传，推动了元朝的天文学、数学的发展，波斯文也开始在中土流行。

蒙元时期，随着西域工匠的大量东来，锻铁器具制造由伊朗地区传入中国，推动了锻铁生产。元代进入中原的西域人（色目人）逐渐为中国文化所同化，回族的形成，对中国多元一体民族格局形成贡献巨大。

13世纪，在伊斯兰文明东传的同时，中华文明通过丝绸之路传播至世界各地。印刷术传到中亚、西亚，再传到欧洲。火器技术传到了日本、高丽、安南和爪哇，火药被带到了欧洲，大力推动了西方科技的发展。此外，指南针技术在蒙元时期已经广泛地应用于航海，推动了世界近代航海事业的开拓。中国三大发明通过丝绸之路西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近代文明的进程。与此同时，中国传统信仰也向外传播。

总之，13—14世纪，蒙元时期丝绸之路的形成与拓展，将亚欧大陆联结为一个整体，以海、陆丝绸之路为组带的世界体系形成，实现了不同经济文化圈之间的互动交流，蒙元时期的国家制度非常积极地维护和推动了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东西方经贸与文化交流臻于鼎盛。